



周恩来的足迹



四川人民出版社

周恩来的足迹

李海文 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年·成都

川新登字001号

书 名 / 周恩来的足迹
编著者 / 李海文 主编

责任编辑 · 倪进云
封面设计 · 龚仁贵

出 版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 3 号 邮编 610012
发 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新华印刷厂
版 次 1992年 3 月 第一版
1992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规 格 787×960mm 1/32
印张 9 字数160千 插页 2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3.05 元
ISBN 7-220-01479-1/K · 195

序

徐惟诚

中国有 8 亿农民。

8 亿农民的状况，是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要因素。

致力于提高 8 亿农民的素质，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

其中就包括向广大农民提供数量足够的、适合农民需要的优秀读物。

可惜，现在供应农村的出版物，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并不是农民不想读书。

如今的农村，已经有了大批高小、初中毕业的学生，还有一些高中文化程度的新农民。

农民要致富，就离不开科学技术知识。怎样选育良种，怎样施肥，怎样兴修水利，怎样防治病虫害，怎样使用薄膜，怎样剪枝，怎样养猪、养鸡，以至各种经济作物的栽培、各种经济动物的饲养，

等等知识都是农民所需要的。

数十万个乡镇企业在农村崛起，近9000万农民进入了乡镇企业。这给广大农村带来了新的希望，也提出了有关生产、经营、管理等一系列新的知识需求。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广大农民的社会交往迅速扩展，同时也就迫切需要了解许多有关的知识。诸如法律、法规、税收、信贷、邮政、交通、电信、汇兑、票据、合同、广告等等，都已经成为许多农民很有兴趣的事情。

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家用电器陆续进入农民的家庭，农村居住的条件也正在变化之中，衣着的用料和款式，家具的式样，卫生的条件，化妆品的运用，都同前几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自然也就需要了解与此有关的许多新的知识。

农民的物质生活改善了，文化生活也要求改善。琴棋书画、吹拉弹唱、耍龙灯、舞狮子、武术、体育、业余创作、新闻报道，在各地农村中都大有人才，更有广泛的爱好者。如何向他们提供指导，也是一件不可忽视的大事。

生活中的许多新变化，使原有的人际关系格局不断受到冲击，一些腐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乘隙而入，一些旧的封建迷信习俗死灰复燃。如何在新的情况下，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传统，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的良好的伦理道德规范，包括如

何尊敬老人，如何教育子女，如何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这些学问既是社会安定和进步的需要，也是广大农民自己切身利益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广大农民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人，还需要了解伟大祖国的历史和现状，了解世界大势，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知识。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我们决定集中编选一套《中国农村文库》。这套文库的内容，力求通俗、简明、实用，希望它能受到广大农村读者的欢迎，对于农村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促进的作用。

但是，由于我们对于做好这样一项伟大的工程缺乏经验，殷切地希望得到广大读者和各方面同志的热情帮助，大家都来出主意，才能使这套大型图书越出越好。

1990年12月2日

顾问: 杨汝岱 王明达 洪绂曾 刘昌杰

主编: 徐惟诚

副主编: 伍 杰 杨牧之 陈焕仁

(常务) 冯国元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吉亭 王朝荣 王锦厚 朱永林

伍 尧 刘治贵 李正模 李光炜

李峰铭 李淑芳 肖士璋 宋 平

张天性 张在德 陈奎宁 陈锡礼

林万清 赵文欣 赵 健 夏树人

倪进云 徐宗钰 钱 铃 黄亚杰

黄 葵 崔泽海 章玉钧 程明松

谢临光 廉正祥 戴安常

出版好农村读物
为广大农民服务

李瑞琰

九十年青

目 录

“这家真难当啊!”	1
革命需要志同道合的伴侣	4
出生入死第一回	8
元帅的引路人	12
机要通讯工作的奠基者	17
机智应付 化险为夷	22
与死神搏斗	28
患难与共草地情	33
延安会谈 一见如故	38
狱中讲演	43
“开门请客”为党做“官”	49
组建第三厅	54
令人敬重的朋友	60
只身勇赴“鸿门宴”	66
一包红枣	72
“这条河，是难不住我的”	75

“讨论”与“实行”	79
迎宋庆龄北上	83
筹建新中国首届“内阁”	88
“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	93
四商建立解放军最高学府	97
“中国人使外交成为艺术”	103
《梁祝》——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108
“知识就是力量”	113
“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	116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不是来吵架的”	120
三次探访李四光	127
海上阅兵	131
特殊的客人	135
总理关怀圆破镜	142
“西联宝岛，南国珍珠”	146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150
与社员张二廷交朋友	155
“干一杯酒，要增加外调粮食一亿斤！”	160
就以你们做民主的据点	163
“一定要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	169
蕴藏艰辛的保护名单	172
七亿人民的好“管家”	179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84
“不能开这个先例！”	189
“你们搞的是恶作剧呀！”	193
不要随便提“打倒”口号	197

挺身而出，保卫中南海！	202
“我不怕被打倒！”	207
“我以党的名义呼吁你们砸烂派性！”	212
数学手稿遗失之后	217
在“接班人”叛逃前后	222
“你们不要那么‘左’！”	228
把基础理论研究抓起来	232
批林批孔批“周公”	236
粉碎“女皇梦”	241
包含歉意的哀思	246
“你这一年干得很好！”	252
临终前的嘱托	257
“英特纳雄耐尔”一定实现！	262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	267
后记	273

“这家真难当啊！”

同许多孩子一样，童年的周恩来也曾在充满幸福与母爱的环境中生活过。

他的生母万氏是一个性格爽朗，精明强干、乐于助人的女人。万氏有三个儿子，因丈夫常年奔波在外，家里的事情全部由她担当起来。周恩来未满周岁时，因为叔父身患重病，身边无子，善良的母亲把他过继给了叔父。这样，一来可使叔父在弥留之际有所安慰，同时也使年轻的叔母有所寄托。虽然周恩来从小过继给他人，但是在几个孩子中，母亲仍旧最喜欢他，出门做客，办事总是带着他，母亲处事公正、坚定、果断的作风深深印在他的心中。

周恩来的叔母，也就是他的过继母亲陈氏虽然出身贫寒，但也算得是书香门第，家庭的影响使她勤于书画，爱好诗文，是一个富有才学的女子。同万氏的性格相反，陈氏十分文静。因年轻守寡，周恩来成为她唯一的依靠。她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个

孩子身上。周恩来从四岁起就在陈氏的教育下开始认字和背诵唐诗，这种文化启蒙，使他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从幼儿时起就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几十年后周恩来还深情地说：“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两个母亲的抚爱给周恩来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

但是，童年的欢乐似乎太短暂了。由于家境日渐衰落，万氏在生活的重压下劳累忧愁而亡。第二年，陈氏也匆匆而去。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周恩来连续承受了失去亲人的巨大打击。那一年，他才十岁。家庭的变故把他过早地推上了人生艰难的路程。

两个母亲的相继逝世改变了周恩来的全部生活。当时，周恩来已随母亲搬到清河县清江浦，他的伯父和父亲都在外做事，家中只有一个残废的叔叔和两个年幼的弟弟。沉重的生活重担不得不落到周恩来稚嫩的肩上，他成为这个败落家庭的当家人。

周恩来当家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处理过继母亲的丧事。当时，生母万氏的丧事刚刚办完不久。万家因是官宦之家对这件事要求很严格，他们不顾周家破落的窘况，坚持按照封建家族的旧规矩来办，不但要求为死者买了楠木棺材，还对出殡时要多少人吹打，多少和尚念经，多少人送葬等都做了严格

的规定。周家没有办法，只好把万氏的棺木寄厝在清江浦的一个庵内。直到许多年后，周恩来的父亲有了一些积蓄，才将灵柩移回淮安县安葬。陈家对过继母亲的丧事没有提出什么要求，但万氏丧事在前，处理不好难免不引起族人的一些非议。周恩来不理睬周围的议论，主张一切从简，当即将过继母亲的灵柩移回淮安与过继父合葬。这种违抗世俗的作法，在封建社会中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两个母亲的丧事花了很多钱，周家又欠下了很多债务。那时候，周恩来领着两个年幼的弟弟回到淮安老家，几乎每天都有债主上门来讨债，要利息。周恩来不得不到处借钱来维持这个家。更糟糕的是，家境虽然破落了，但封建家族的旧习俗还仍旧存在。大家族中矛盾重重，关系复杂，生老病死样样需要应酬。为了记住这些事情，他在家中的墙上贴了一张纸，记下亲戚朋友的生日和忌日，到时候就是靠典当、借钱也要把礼送到。

这种令人窒息的生活过了一年多。童年的烙印是深刻的，周恩来后来还时常回忆起这段生活，不无感慨地说：“这家真难当啊！”

然而，正是这种饱含艰辛的生活激发了他对封建世俗的憎恨，锻炼了他的意志和能力。革命胜利后，他作为国家总理的当家本领，或许在儿时的磨炼中已经萌芽。

廖心文

革命需要志同道合的伴侣

周恩来去世后，在他的灵堂前摆着一个素洁的花圈，白色的挽带上浓墨写着“小超哀献”。透过这含泪的墨迹，人们充分感受到这对恩爱夫妻之间多么难舍难分的深切感情。

周恩来与邓颖超共同生活了五十年。在这五十年中，他们饱尝过离别的担忧与思念，经历过白色恐怖与炮火硝烟。为探索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道路，周恩来有过不可避免的失误，也受过不公正的待遇。但是，对他们俩人来说，这始终是相爱、相敬、相助的五十年。

周恩来常常为自己正确地选择了这样一位能够同生死、共患难的妻子而感到欣慰。因此，他也常常以此来教育晚辈们，告诉他们做为一个革命者究竟应该如何来选择终身的伴侣。

1956年，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处于一个伟大的转变时期。外交，内政的担子双双落在周恩

来的肩上。他的工作十分繁忙，甚至卫生间都成为他的第一办公室。可是，当他听说自己的侄女周秉德在婚姻的选择上遇到困难时，觉得再忙也要抽时间同孩子谈一谈，他认为这是做长辈的责任。

一天，周恩来处理完案头的工作，不顾身体的疲劳，把周秉德约到家里来。为了打消她的顾虑，周恩来首先亲切地对她说：“你的事情本来应该由你自己来决定，由你自己来选择。但是，伯伯我毕竟是过来人了，有些事情，应该讲给你听一听，或许对你在处理这个问题时能有所帮助。”一席温暖的话语，使两代人的距离靠得很近很近了。

周恩来第一次向晚辈们坦露了自己的“秘密”。

周恩来在青年时期就对婚姻和恋爱问题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1918年旅日时期，他曾在日记本上记下了自己的看法：“人生在世，恋爱是一种事，夫妻又是一种事，恋爱的范围广，夫妻的范围狭。恋爱是可以有夫妻这一义，而夫妻绝不一定是包括恋爱的。夫妻由恋爱中生出来的，是真夫妻。若随旁人的捉弄或是动于一时感情的，这个夫妻实在是没有什么大价值。”也许正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他在旅日之前，没有接受南开校董严修家的亲事。那时，他对自己的好朋友张鸿浩说过：“我是个穷学生，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的前途一定会受严家支配，因此辞却了。”也可能是这件事使他对婚姻问题做了一番认真的思考，得出了上面这段虽然不尽成熟，但颇富哲理的见解。

1920年底，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在那里，他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随着生活道路的选择和年龄的增长，周恩来对婚姻问题有了更深刻与明确的认识。

旅法期间，他曾同一位美丽的姑娘十分接近，这位姑娘在五四运动时期和他与邓颖超一起在天津搞过学生运动，又都是觉悟社的成员，彼此是好朋友。但是，同邓颖超相比，这个姑娘政治上比较软弱，后来脱离了革命。而邓颖超当时虽然年龄要小得多，但已显露出对革命执着追求的精神和相当的工作能力。

回忆起这些往事，周恩来对他的侄女说：“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她不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她经受不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指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立关系的。”

一直在旁专心谛听的邓颖超这时把两手一张，诙谐地说：“怪不得那会儿突然就接到你的信呢！”大家不禁笑出声来，周恩来的笑声格外爽朗。

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后来，这个女孩子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深有感触地说：“关于我们的婚姻、恋爱问题，他们从不把意见强加于我们，而是进行启发和引导。”

周恩来的这次谈话，给她在选择人生伴侣上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最深切的一点就是“革命需要志